

##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 习近平致谢的 国际友人都是谁?

□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殊

中共中央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国务院、全国政协、中央军委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。习近平讲话时特别提到3位国际友人——德国的、丹麦的、美国的都是何许人也?



约翰·拉贝(德国)

### 约翰·拉贝： 为25万中国平民提供避难场所

约翰·拉贝撰写了著名的《拉贝日记》。今年3月，习近平访问德国期间发表演讲时，就曾提到他。

据公开报道，南京大屠杀期间，约翰·拉贝时任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，他和二十几位外国人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，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，也因此获得“南京的辛德勒”的美誉。拉贝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大屠杀内情，《拉贝日记》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。

1996年12月，尘封了六十年的《拉贝日记》由其外孙女莱茵哈特夫人奉献给世人。

### 贝恩哈尔·辛德贝格： 插国旗阻止日军进入难民区

1937年冬至1938年春，丹麦人贝恩哈尔·辛德贝格受雇于丹麦史密司公司，在南京栖霞地区的江南水泥厂维护水泥生产设备。南京大屠杀期间，辛德贝格与他的德国同事一起设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区，保护了约两万多名中国人，并为南京城内从事人道救助的国际人士提供消息和食品。

他还将被日军残害的中国人从郊区送往医院，并在厂里建立诊疗所。为阻止日军进入难民区，辛德贝格在水泥厂周围插满丹麦和德国国旗。



贝恩哈尔·辛德贝格(丹麦)

### 约翰·马吉： 炮火中摄录105分钟日军暴行

1912年，约翰·马吉作为一名传教士被派赴中国南京挹江门附近的德胜教堂工作。日军进攻南京时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举起了摄像机。从日军攻陷南京起，他拍摄了4盘放映长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。在他的镜头中，有日军疯狂炮击南京城的画面，有被蹂躏后痛苦万分的妇女，还有被汽油烧焦的尸体。

他拍摄的胶片于1938年初，由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的美国人乔治·费里秘密带到上海，之后被编辑制作成纪录片。(摘自《新京报》)



约翰·马吉(美国)

## 大文豪苏东坡也爱用“呵呵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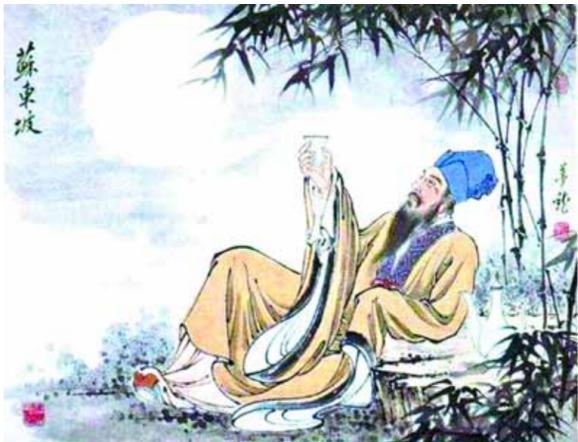
留世书简中现数十处

如今，网上行走，常见“呵呵”二字。当有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时，就用“呵呵”两个字应急，它可以是率性默许，可以是保留意见，可以是偶逢知己的会心一笑，可以是发表异议前的情绪缓冲。“呵呵”代表的意义竟是如此善变。

可谁曾想到，早在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，就有人漫不经心地留下“呵呵”二字。穿越时空，方知“呵呵”用得最多的是大文豪苏轼。他曾写信给好友：“近作小词，虽无柳七郎风味，亦自是一家，呵呵。”显然是对自己的新词颇为得意。他给因“河东狮吼”出名的好友陈季常写信：“一枕无碍睡，辄亦得之耳，呵呵。”意思是只要晚上睡得舒爽，写词只是小意思。

苏轼留下大量书简，短则十余字，长则百字，内容有军国大事，也有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更有“呵呵”数十处以资调笑。他写信教友人做菜：“取笋簞松心与蕈相对，清水煮熟，用姜葱自然汁及酒三物等，入少盐，渐渐点洒之，过熟可食。不敢独味此，请依法作，与老嫂共之。呵呵。”小小的饮食诀窍居然也能带来如许乐趣。

元丰元年，苏东坡跟文与可开玩笑，在《文与可》一信中写道：“不尔，不惟到处乱画，题文与可，亦当执所惠句过状索二百五十疋也。呵呵。”意思是说，要是文与可给自己画画的话，苏东坡就要自己到处乱画，还要署上文与可的名字。或者拿着文与可给他承诺画画的绝句去告状索贿了。



苏轼(宋)

# 古代的御史是如何反腐的

在古代，扮演反腐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台，当然后来也有都察院之类的称谓。御史不理庶政，过去叫“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”(《明史》)，这是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内容。那么，古代的御史是如何反腐的?

### 御史咋行使职权? 不受同级、上级行政长官干预

据考证，以御史弹劾为核心的监察制度创立于秦，秦和西汉的中央监察机关称御史大夫府，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，虽为副丞相，但并不受丞相领导，而是与丞相和太尉同位三公，受皇帝领导。西汉末到东汉，御史府演变为御史台，放在皇室的亲信机构少府，与尚书台、谒者台合称“三台”，御史中丞作为台主与司隶校尉、尚书令号称“三独坐”，具有独特的地位。至魏晋，御史台脱离少府，成为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，历代承袭而不改。(郑永明《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)

为何古代中国要建立一套监察制度呢?因为各级官员是皇帝请来的“打工仔”，老板怕打工的偷懒怠工、贪赃枉法、徇私舞弊，挖帝国公司的墙脚，导致帝国大厦倾覆，所以找一些监工来监督他们，使其尽职尽责，不敢贪腐。御史既然是监工，当然不能由被监督者推选任免，而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免，其他部门想插手基本上不行。

皇帝的监工是“朝廷耳目”，故要格外精挑细选。比如唐代要求：“凡所取御史，必先质勇退者。”宋代要求：“御史必用忠厚淳直、通明治体之人，以革薄荡之弊。”明代要求：“当用清谨介直之

士。清则无私，谨则无忽，介直则敢言。”可见，从选人开始，就注重正人先正己，以树立御史的权威。“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”，御史由皇帝任免，直接对皇帝负责，不受同级、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，甚至不受御史台长官左右。御史出巡回京，“或露章面核，或封章奏核”，直接向皇帝汇报，无须经台主转呈，哪怕台主转呈也不能拆阅。同时，皇帝还赋予御史“大事奏裁，小事立断”的高尚宝剑，在特殊情况下，御史可以“便宜从事”，先斩后奏。

为了避免御史行使职权受干扰，在组织编制和地位上，御史台与行政、司法、军事等部门平行而立，不受其他部门管辖，完全独立，自成体系。比如唐代御史台下设台院、殿院、察院，分工监察，各负其责。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是如此，由中央派出御史(不朝代称谓时有不同)到地方，设立派出机构，垂直管理。比如汉代的十三刺史，是中央派出官员，设立州衙门，不受地方管辖节制。刺史的官秩只有六百石(相当于低级县令)，却敢以贱察贵，监督官秩二千石的郡守、刺史“到所部，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，所察六条”。

谁来监督御史?  
汉朝设司隶校尉、丞相司直与御史台互相监督

孟德斯鸠说过：“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，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。”御史监督别人，谁来监督御史呢?御史也是人，还是有特权的人，御史不受监督同样会腐败。御史对皇帝负责，皇帝显然可以监督御史，可皇帝有三头六臂也不

可能监督得过来，所以，皇帝想出了用监工来监督监工的办法。比如汉武帝设立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，司隶校尉是皇帝特设的独立监察机关，负责监督京畿地区百官，理当包括御史台的官员;丞相司直监察政府行政官吏，无论中央地方，都可以监督;而这两个机构又都受御史台的监督，于是形成了三者互相独立，各成体系，又互相弹劾的异体监督格局。

又比如宋神宗在尚书省设都司御史房，是一个专掌弹劾御史失职之事的监察部门，其劾举御史失职之事，作为皇帝黜陟御史的依据。通过这个机构，行政部门可以纠察御史的失职行为，制约其滥用职权。通过一整套制度设立，御史对整饬吏治，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在皇权政治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御史扳倒贪官的事例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，我们讲个级别大一点的——御史弹劾首辅严嵩。

为了扳倒权臣严嵩，  
十位御史前仆后继

严嵩是明代权臣，从嘉靖二十一年至嘉靖四十四年，盘踞津要，“窃政二十年，祸臣恶子，流毒天下，人咸指目为奸臣”。(《明史·严嵩传》)而御史对他的弹劾可谓前仆后继。从嘉靖十六年严嵩还没有入阁开始，御史桑乔就弹劾严嵩“上负国恩，下乘舆望”;嘉靖十九年，御史谢瑜弹劾严嵩“矫饰浮词，欺罔君上，箝制言官”;到御史邹应龙扳倒严嵩时，前面共有十位御史或给事中弹劾过严嵩，但都没有好下场，不是被贬、除名、下狱，就是被廷杖打死。对此，连修《明史》的人都不得不说：“当世宗之代，何直臣多欤!重者显戮，次乃长系，最幸者得贬斥，未

助教，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。”

古代教师称谓很多，继秦汉出现“博士”后，到宋代教师又有了一个的称谓“教授”。石介、孙复、胡瑗等宋代一批著名学者都被聘为太学教授。宋代是民办学校开始兴起和繁荣的时代，私塾抓得很紧，要当上“公办教师”同样得考课。

宋熙宁八年(公元1076年)实施的“教官制”制度，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的教育主管和教师资格考试。《文献通考·学校七》称，由于考试过严，元丰元年(公元1078年)，全国州、县的教授“只五十三员”，“盖重师儒之官，不肯轻授滥设故也。”

在唐宋及以前，对教师业务的考核主要在“教学量”上，明代则开始与教学质量与升学率挂钩。明朝对教育主管和教师的考核，除了和其他行业官吏相同的“考满”、“考察”外，还单设有“学官考课法”。

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。早在西周时期，《太公家教》已记载有“弟子事师，敬同于父”;春秋时期的孔子更留下了“有教无类”等至理名言……在中国古代，教师一直是备受尊重的一个职业。那么，古代什么人才当老师?现代要想当老师得有从业资格证，古代“教师”从业也要通过考试吗?

古代“教师”从业也得通过考试

《登科记考》记载：“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。”

在西汉以前，教师多是推荐，并不需要从业考试。但到东汉时期，中国出现了教师“资格考试”——要想成为太学博士，得通过太常主持的考试(有点类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试)。当时，经学名流才有任职资格，而且，对教师个人的教学经历和年龄都有相应的规定，要求曾教过学生50名以上，年龄不小于50岁。

隋唐时期，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官学制度。官学，相当于今天的公办学校，既有小学，也有大学;既有综合性学校，也有专科学校。当然，教学管理和要求也更规范更严格了，对教师从业资格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办法。

唐代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在内的学官，同其他官员一样，均要定期“考课”，一般每年一小考，三至五年一大考。考核内容分业务、品德及教学效果等，考核结果分为九等。其中，授课数量是考核定级的重要标准之一。此即《登科记考》中所说的：“诸博士、

助教，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。”

古代教师称谓很多，继秦汉出现“博士”后，到宋代教师又有了一个的称谓“教授”。石介、孙复、胡瑗等宋代一批著名学者都被聘为太学教授。宋代是民办学校开始兴起和繁荣的时代，私塾抓得很紧，要当上“公办教师”同样得考课。

宋熙宁八年(公元1076年)实施的“教官制”制度，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的教育主管和教师资格考试。《文献通考·学校七》称，由于考试过严，元丰元年(公元1078年)，全国州、县的教授“只五十三员”，“盖重师儒之官，不肯轻授滥设故也。”

古代教学成绩也与“升学率”挂钩

《明会典》记载：“府学教授有9名学生在乡试中举”方可升职。

为两种，一种鼓面加彩绘装饰，如河南淮阳、江苏盐城、北京等地的拨浪鼓，都在鼓皮上描绘各色花纹;第二种是在鼓身加彩绘，沿着鼓身画一周花纹。这些装饰，增加了拨浪鼓的审美特色，从视觉效果上强化了这种玩具的娱乐特征。鼓面材料以牛皮、羊皮为最常见，其次又有蛇皮、皮纸、油纸多种。鼓身多为木质，不过，近年已见塑料鼓。鼓耳则以玻璃珠为常见，其次又有用瓷(yi)米、酸枣核、木珠、瓷珠等材料制作双耳者。

关于拨浪鼓的名称，历代不同，各地也不尽相同，总体说来有鞞、鞞鼓、拨浪鼓、波浪鼓、播郎鼓、博浪鼓、播咕咚、小鼓等等。其实，以上诸多名称，皆因写法不同而来，发音近似，取字不一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还是“拨浪鼓”这个名称最得人心。

纵观拨浪鼓的古今，自先秦时期鞞鼓诞生直到今天，拨浪鼓这种乐器与玩具的形态居然没有什么变化。历代绘画、图案中的拨浪鼓，与今天的拨浪鼓大都大同小异。一种玩具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传，不改初创之型，真是难以置信。

(摘自《大连日报》)

敦煌壁画中的拨浪鼓

有苟全者。然主威愈震，而士气不衰，处之泰然，足使顽懦知所兴起，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。”

后来，严嵩与徐阶互斗，严嵩斗不过徐阶，明世宗越来越倚重徐阶，将严嵩冷落一边，徐阶将严嵩败相渐露的信息透露给御史邹应龙。邹应龙冒险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赃误国，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，以“纵爱逆子，辜负圣恩”之过，将严嵩革职，令其回乡。

最后，御史林润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，说他勾结倭寇，图谋造反，明世宗震怒，将严世蕃处斩，严嵩削职为民，所有家产被抄没——一代权臣终被扳倒。

虽说古代帝王为了监督百官，想了尽监察的办法，尤其是明代监察“组织之密、取权之广、权威之重、委寄之深，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”，但从十多位御史艰难扳倒严嵩的史实仍可看出：首先，御史是靠不住的，监察体系严密如明代，加之御史“士气不衰”，仍无法阻止严嵩边腐边升官，以至于盘踞权力津要20年，成为“不倒翁”。可见，监察管不管用，不在皇帝——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，至为关键。

所谓“圣主直臣”，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心纳谏的皇帝，御史尚能发挥作用;遇到像明世宗这样“厌薄言官，废黜相继，纳谏之风微矣”的皇帝，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，痛加责罚，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。明代监察“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”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。

第二，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，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、打击异己的工具。事实上，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，受贿敛财肆无忌惮，很大程

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，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。严嵩通过一系列购买笼络手腕，操纵御史，设立弹劾“防护墙”，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，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。只不过，严嵩收买笼络御史，他的对手也会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严嵩还是被御史参了要命的一本。

第三，对那些无法操纵御史的官员来说，御史是得罪不起的，其举可以让自己升官发财，其劾则让自己受处分甚至性命不保，“一言以定兴废”。为了不让御史弹劾自己，官员难免百般讨好，大献殷勤，有的御史也是来者不拒，互取所需，猫鼠一家亲。于是御史出巡，表面上看是“代天子巡狩”，实则是一路搜财。

虞云国先生在《晚明的贪腐：体制性的不治之症》一文中举了诸多明代御史贪墨的例子，在此不妨摘录两例。一者，御史陈志先按察江西，途中丢失四件行李，为地方官查获，发现“其中皆金宝”，还有受贿簿，记载受贿“不下数万”。可见，巡按御史黄廷聘过衡山县，知县陈安志不满他托大无礼，一怒之下打开其行篋，暴露“金银诸物甚夥”。事情闹上朝廷，黄廷聘受了“冠带闲住”的处分。

对御史出巡中的丑行，清代伍廷芳曾有痛切陈议：“既需给以盘川，又累地方之供应。所带不法人役，时或狐假虎威，苛索抽丰，沿途骚扰，是为耗费民之一害。”本来是用心用思反腐的，结果御史本身成为贪腐重灾区，当纠肃贪腐的御史成了贪腐的急先锋时，就不是哪一个、哪一部官员贪腐的问题了，而是体制性的贪腐。而连打铁者自己也腐化了，哪里还有干净的呢?故吴晗先生说：“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。”

(摘自《同舟共进》)

如果“岁考”中，府学24人、州学16人、县学12人以上无长进，要取消教师资格，巡按御史或按察使有权直接开除(罢黜)教师。不仅教师被处理，府州、县的地方官员也跟着受罚，要被处以“答刑”。

对国子监教师的考核更加严厉。曾任明代南京国子监祭酒(相当于大学校长)的黄佐，在其《南雍记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：永乐七年(公元1409年)六月，北京国子监学生唐谦等想出来做官，吏部安排考试，结果成绩很差，“不通经书”。按规定应该将主管教学的司业(相当于副校长)赵季通治罪。明成祖朱棣听说后，放过了他，但就此向全国下发“红头文件”，规定“凡弟子再试不知文理者，并罪其师，发烟瘴地面安置”。

学生学不好，教师要被发到环境恶劣的地方去，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，考核教师最狠的一项规定。

(摘自《南京日报》)

为两种，一种鼓面加彩绘装饰，如河南淮阳、江苏盐城、北京等地的拨浪鼓，都在鼓皮上描绘各色花纹;第二种是在鼓身加彩绘，沿着鼓身画一周花纹。这些装饰，增加了拨浪鼓的审美特色，从视觉效果上强化了这种玩具的娱乐特征。鼓面材料以牛皮、羊皮为最常见，其次又有蛇皮、皮纸、油纸多种。鼓身多为木质，不过，近年已见塑料鼓。鼓耳则以玻璃珠为常见，其次又有用瓷(yi)米、酸枣核、木珠、瓷珠等材料制作双耳者。

关于拨浪鼓的名称，历代不同，各地也不尽相同，总体说来有鞞、鞞鼓、拨浪鼓、波浪鼓、播郎鼓、博浪鼓、播咕咚、小鼓等等。其实，以上诸多名称，皆因写法不同而来，发音近似，取字不一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还是“拨浪鼓”这个名称最得人心。

纵观拨浪鼓的古今，自先秦时期鞞鼓诞生直到今天，拨浪鼓这种乐器与玩具的形态居然没有什么变化。历代绘画、图案中的拨浪鼓，与今天的拨浪鼓大都大同小异。一种玩具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流传，不改初创之型，真是难以置信。

敦煌壁画中的拨浪鼓

敦煌壁画中的拨浪鼓